



ZAIHOU

QIANGZU

SHEHUI

WENHUA

BIANQIAN

YANJIU

彭陟焱 周毓华 武玮 田廷广 © 著

灾后羌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邛崃南宝山安置区为例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13YJA850012）
西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出版

灾后羌族 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邛崃南宝山安置区为例

彭陟焱 周毓华 武玮 田廷广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灾后羌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邛崃南宝山安置区
为例/彭陟焱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105 - 14940 - 7

I. ①灾… II. ①彭… III. ①羌族—民族文化—
研究—邛崃 IV. ①K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0199 号

责任编辑:乔 丽

封面设计:孟 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86 千字

印 张:6.375

定 价:19.8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940 - 7/K · 2606(汉 147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目 录

第一章 田野调查概况	(1)
第一节 理论阐述与问题缘起	(1)
一、理论阐述	(1)
二、问题的缘起	(5)
第二节 羌族历史沿革与记忆中的老寨	(8)
一、羌族历史沿革	(8)
二、记忆中的老寨	(19)
第三节 南宝山安置区羌族村民的新家	(27)
一、地震后的安置过程	(27)
二、南宝山安置区概况	(30)
第二章 南宝山安置区羌族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 变迁	(36)
第一节 羌族社会结构变迁	(36)
一、羌族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36)
二、南宝山安置区羌族社会行政关系的改变与 地缘、业缘的加强	(39)
第二节 羌族村民生产方式的变迁	(42)
一、村民关于包产到户的历史记忆	(43)
二、村民劳动时间与劳作周期的变化	(46)
三、村民劳动心态的变化	(50)

四、生产上的多种探索与劳动内容的改变	(53)
五、劳动方式的转变与选择	(56)
第三章 南宝山安置区羌族村民日常生活的变化	(60)
第一节 羌族村民饮食文化的变化	(60)
一、饮食文化的变化	(61)
二、地缘与业缘互动空间延展下的饮食文化	(66)
三、外来工业化食品对饮食习惯的影响	(70)
第二节 羌族村民传统节日的改变	(74)
一、老寨的羌历年	(74)
二、新家的羌历年	(81)
第三节 羌族婚俗的变化	(92)
一、老寨的羌族婚俗	(92)
二、新家的羌族婚俗	(97)
第四章 南宝山安置区羌族村民生活观念的转变	(110)
第一节 经济观念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110)
一、经济观念的变化	(110)
二、消费观念的变化	(117)
第二节 生育观念与教育观念的变化	(121)
一、生育观念的变化	(121)
二、教育观念的变化	(131)
第五章 南宝山安置区羌族村民的宗教世界	(138)
第一节 羌族的宗教信仰	(138)
一、羌族宗教的二元哲学观	(138)
二、羌族的“神羊”信仰	(142)

三、羌族的白石崇拜	(145)
第二节 现代化生存方式下的羌族宗教	(149)
一、羌族宗教生存环境的改变	(149)
二、市场经济下文化产业开发之需要	(151)
第三节 羌族宗教信仰与释比世界的变化	(156)
一、羌族多神信仰的变化	(156)
二、羌族释比世界的变化	(166)
 结语 羌族异地安置区的社会文化变迁	 (173)
 参考书目	 (177)
 索 引	 (192)
 后 记	 (195)

第一章 田野调查概况

第一节 理论阐述与问题缘起

一、理论阐述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文化多元论的视角出发，运用文化变迁理论指导具体工作。文化多元论，是美国学者卡伦 1924 年提出的。他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文化多元论承认不同族群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序言中的平等思想是相互吻合的。美国移民问题研究专家斯特芬·卡斯特（Stephen Castles）从移民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其一，外来移民有权成为移民国的公民；其二，给予外来移民群体平等的权益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其三，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或个人有权要求得到尊重；其四，主流社会应当根据外来移民族群的特殊文化需求修订相关政策。^① 此外，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在 1998 年出版的《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提出“文明共存

^①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转引自程瑜：《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39~40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论”。作者批驳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指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认为,当代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不是对抗和冲突,而是共存和对话。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因此,他主张以“文化的共存”代替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① 在研究异地安置区羌族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笔者从文化多元论的视角去分析问题、阐述问题,而不是以熔炉论或者同化论^②的视角去研究该课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事物会年复一年地保持不变。即使是最稳固的群体,做事的新方式也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当一个澳大利亚土著梦到一个新的神话并讲给他的群体成员时;当餐馆厨房里的装卸工发明了一种在洗碗机中更加快捷地堆盘子的方法时;或者当新几内亚的头人引用了传统的关于幽灵的信仰为殖民统治设计的新政府的存在辩护时,变化便发生了。当人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自然和社会时,文化变迁便发生了。不论范围的宽窄,速度的快慢,这样的变迁就是人类

① 何兴亮:《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补》,见周大鸣、何兴亮主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57~5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② 熔炉论:由美国学者克勤勒夫科尔(Hector St. John Crevecoeur)提出,他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继他之后,还有社会学家肯尼迪提出的三重熔炉论(Triple Melting Pots),即美国存在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座熔炉。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 Stuart)提出了变形熔炉论(Transmuting Pot),他认为各民族文化在美国熔炉中被变形为美国文化。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按照美国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帕克·罗伯特(Robert E. Park)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年版)“社会同化”所下的定义:“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共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参见程瑜:《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38~3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社会生活的一部分。^①文化变迁是西方近代文化研究史上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周大鸣、秦红增在其著作中指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前者是单个文化特质或文化丛的独自变化;后者则是文化整体或是大部分特质的变化。^②文化变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创新和借用。创新(innovation)是指新方式在质上的发明,它包括人们把已经熟悉的东西合并成不同的东西。当传统文化处于运作不再良好的急迫时刻,创新更有可能发生并被接受。另一种文化变迁的基础是借用(borrowing)。借用,有时候称为传播(diffusion),指的是从其他的群体采纳新事物。不管是创新还是借用,它在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之前都必须经过一个被社会接受(social acceptance)的过程。为了获得社会接纳,创新必须为社会成员所认识,被有效地接受,纳入文化知识体系。^③宋蜀华、陈克进主编的《中国民族概论》一书对文化变迁的表述如下^④:

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所使用的“变迁”的含义是什么?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易于回答,简单地说,变迁是指技术、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及行为准则的变化性。但是,当我们仔细考查某一特殊的社会进程时,总是难以确定是否发生过变迁,更不要说这种变迁是如何或为何发生的。所谓文化变

① 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念》,7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② 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念》,75~7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③ 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念》,7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④ 宋蜀华、陈克进:《中国民族概论》,209~210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迁,是指任何足以影响文化内容或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化变迁的方式又可称为“文化过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作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项主要研究课题由来已久。以斯宾塞、泰勒、摩尔根、费雷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了文化变迁的最初研究,不过,他们使用的是“进化”一词,而不是“文化变迁”的概念。从理论上讲,任何进化都是进步,而变迁未必如此。古典进化学派采取因素主义与文化残留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建构人类学社会与文化的单线进化模式,以人类心智的一致性解释文化发展的普同性,探索的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主题,忽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传播学派侧重于研究进化学派忽视的文化的地域、空间与地方性的变异,把人类文化的变迁过程在本质上理解成传播过程。传播学派把传统夸大到对文化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走极端,出现了泛埃及主义、泛巴比伦学说等,但重视传播的作用,对文化变迁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博厄斯和他的追随者建立的美国历史学派热衷于对文化进行纯客观描述,他们所获取的大量的具体实证的民族学资料,使人们得以触及某一具体文化变迁的实际过程。后来开创文化变迁研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大多或出于博厄斯门下,或受其影响深刻。继历史学派之后,心理学派以文化与人格为主题,对文化适应、社会文化的心理过程、文化对人格塑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心理学派对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系列研究,拓展了视野,为文化变迁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变迁的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很大发展,各方面都显得十分活跃,仅人类学领域每年就有 300 种以上有关文化变迁的书籍和论文出版发表。

文化变迁也是社会学中十分重视的一大课题。社会学家所

使用的“社会变迁”一词，或者包括文化变迁的内容，或者等同于文化变迁，有时干脆使用“社会文化变迁”一词。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于1922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一书，是研究文化变迁的一本专著。他在这本书中揭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①。他认为，“我们现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在社会学的进化理论和实际规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不仅需要社会学的研究，还要借助于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如生物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②奥格本给出了文化变迁的四个因素：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他认为，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来自物质文化的变迁，社会学把文化变迁研究聚焦在现代社会，促使文化变迁成为当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门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变迁研究常常以社区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社会过程等为对象而展开，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也正在日益成为应用人类学和应用民族学的理论基础。

二、问题的缘起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实行异地安置政策的羌族村民成为一种特殊的移民群体。也就是说，灾难一旦发生，常常会导致整个社会进入范·盖纳普所说的阈限^③阶段。在灾后

① [美]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译者序，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② [美]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前言，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③ [英]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2版，鲍雯妍、张亚辉译，21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紧急赈灾过程中,社会往往会呈现出维克多·特纳所指的交融状态。^①“具体而言,灾后的应急赈灾更像是一场具有交融状态特征的社会运动,而灾后重建则是一个系统漫长的社会工程。前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各种社会关系聚集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和场景中,并以一种社会剧场的方式将社会结构中的族群、阶层、性别、地域等关系界限打破,人们被凝聚在一起共同应对灾难和危机,并一同形塑和见证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如此,突发事件呈现出了一个与日常状态有别的社会场景和社会进程,并将各种社会关系和精神情感汇聚在一起,从而使得社会深层的结构关系和价值体系被凸显出来,这给予了人类学者一个难得的理解社会运作和文化逻辑场景的机会。后者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恢复过程,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按照一定的社会框架和权力格局被重新整合与分配,特别是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之下,灾区的社会生活将在各种干预主体之下被重新塑造。”^②

搬迁至南宝山安置区的羌族村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兼具自愿性与非自愿性移民性质的特殊移民群体。所谓非自愿移民,即因工程项目的兴建、自然灾害的发生、生态环境恶化和各种社会冲突引发的强制性的人口迁移与经济社会重建活动。根据国际上达成的比较统一的共识,非自愿移民可分为冲突性移民 (Conflict Induced Forced Migration)、工程性移民 (Development Induced Resettlement)、灾害性移民 (Disaster Forced Migration)、生态环境性移民 (Ecological Migration)、经济性移民 (Immigration)、扶贫性移民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ced Migra-

① [英]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96~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张原、汤芸:《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13~18页。

tion)^①。其中,灾害性移民是指因干旱、洪水、狂风暴雨、冰雹、地震、蝗虫、海啸、火山爆发、泥石流、山崩、瘟疫等自然灾害因素胁迫导致的人口迁移。

由于非自愿移民具有不可选择的特征,其安置较自愿移民更为艰难和复杂。非自愿移民的迁移、安置与生计恢复工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口、资源、环境、民族、工程技术诸多领域。^②汶川地震后,对部分羌族村寨实行异地安置,既有自愿性因素,又有非自愿性因素,二者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交融。作为移民主体,被安置的羌族村民享受着国家在住房、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政策性补贴。政策性补偿给予移民一个优惠的政策空间,可以激发移民的创造性,减少移民的依赖性。它不是一种经济补偿,而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如果利用得当,能够给移民带来长久的利益,但前提条件是村民必须自己去利用这个政策。换言之,这个政策给予的补偿是无限的,也是无法计量的。政策性补偿包括帮助移民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帮助移民熟悉市场规律和进入市场经济;通过设立移民发展保障体系这样的政策性补偿来帮助移民进行发展,在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确保移民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设立移民发展基金,增强移民群体的经济实力,促使移民集体建立领导权威。^③

总之,人口迁移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社会现象,它的出

① 施国庆、周建、连欢:《非自愿移民: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见周大鸣、何星亮主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37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② 施国庆、周建、连欢:《非自愿移民: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见周大鸣、何星亮主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37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③ 程瑜:《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92~9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现是伴随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及自然灾害等主动性生存和被动性生存而产生的。同时,人口流动也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它将影响社会及文化的变迁。今天,邛崃异地安置区羌族村民的迁移是中国新时期移民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从大的趋势看,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生活的地方,离开熟悉的社区,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折不扣的非自愿性移民。但对每一个移民家庭而言,他们在选择迁入地点时,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耕地情况、房屋的构建和村落的选址等方面,都是事先由每户村民代表亲自考察并同意的,因此,对于安置区的羌族村民来说,他们既不属于自愿性移民,也不属于非自愿性移民,而是兼具二者特点的一种特殊移民。

作为特殊的移民群体,居住在南宝山的羌族村民在选择生活环境、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其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民族风俗、宗教文化等都将发生改变。那么,如何在社会文化变迁理论视域下探讨他们新的环境中生产与生活的情况,如何传承与保护羌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其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便成为安置区内的民族主体必须面对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本书中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二节 羌族历史沿革与记忆中的老寨

一、羌族历史沿革

羌族自称“尔玛”(xma)、“玛”、“尔麦”(xme)或“日玛”(zma)、“日麦”(zme),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所辖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和绵阳市的北川

羌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北川县”）以及平武县。其余散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的丹巴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石阡、江口等县。

在我国古老的传说里，有许多关于“羌”或“姜”的记叙。《说文·羊部》解释“羌”意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亦称：“羌，本西戎卑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①古人把“羌”视为从事畜牧业且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而“姜”应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是其最先进的部分。传说我国农业始祖炎帝神农氏即为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②在不断的迁徙和壮大的过程中，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联盟的接触更加频繁，关系日渐密切。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夏禹是羌人的后裔，《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从黄帝至尧、舜、禹时期，由于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长期交往融合，共同构成华夏族——汉族的前身，这部分羌人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培育后来昌盛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故至今中华民族仍

① 《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四，严可均辑入《全后汉文·风俗通义佚文》。又，于省吾先生认为：“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参见于省吾：《释羌、苟、敬、美》，载《吉林大学学报》，1963（1），43~50页。

②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至今阿坝州嘉戎藏人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传说额尔冬爷爷如同格萨尔大王一样，神通广大，他战胜妖魔后，嘉戎藏人方得以生存。额尔冬的法像即牛首人身。土司、守备、头人每年都要做一个高二尺的牛首人身神，供在家中。墙上也要用白石嵌一牛头。凡杀牛时，牛头不能吃，要供在屋顶之上。参见邓廷良：《甲绒与牦牛羌》，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2），232~235页。

被泛称为“炎黄子孙”。而未进入中原的大部分羌人依然过着游牧的生活，其后裔便是殷商时期的羌人。

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就已有羌人的身影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商将羌地的方国或部落称为“羌方”。因商王朝对于邻近臣属的部落往往依照他们原来的名号给予侯、伯等爵位，如封井方为井伯，犬方为犬侯，虎方为虎侯，羌方也曾被封为羌伯。羌的疆域广大，北面和鬼方、邛方相邻，东面有沚、吴、易、雀、犬、周等国，东南近缶和蜀。大致来说，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① 向东则已达到今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②。

传说周人先妣姜嫄，是姜部落之女，因在野外踏了巨人足迹，遂生一子，以为不祥，曾欲丢弃，其后乃名曰“弃”。周人对姜嫄十分崇敬，甚至把她作为始祖母。西周末年，周王朝政治腐败，王室内部纷争，力量渐弱，诸侯强大，王室一蹶不振。羌人中生产水平最高、接受中原文化最多、与周王室关系最密切的姜人，在周代开始融合于华夏人之中。东周时期，以羌人为主体的诸戎开始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散居各地，异常活跃。后来秦国向西开拓，引起了西北地区羌人的极大震动，同时也给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秦献公时，羌人繁衍日众，加之秦国势力的威胁，遂更大规模地向外流动，特别是向西南迁徙，有所谓“广汉羌”“武都羌”^③ 等名。

公元前 206 年，西汉王朝建立，出于保塞之目的，西汉朝

① 顾颉刚：《从古籍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1），117～152 页。

②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35～78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287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迁“隔断羌胡”，将羌人内迁。进入中原的羌人后来基本上与汉人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陇西外，大多散布于长城以西，特别是河湟地区。此时羌人以畜牧为主，但也有了农业。羌人部落繁多，或以动物之名为号，如白马、牦牛、参狼、黄羝、黄羊、黄牛等，这可能是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或以地名为号，如勒姐、卑湍，这部分羌人可能已进入地缘性联盟的阶段；较强大的先零羌、烧当羌则以父名为号，这实际上是父系氏族父子连名制的习惯。此外尚有当煎、效功、虔人、沈氏、傅难、巩唐、罕、乌吾、钟存、乡姐、累姐、离湍、狐奴、牢姐、封养、卑湍、当阬、全无、且冻、莫须等部落。汉代在西羌地区的行政建制，以汉武帝列置四郡为其开端。《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骠骑将军降浑邪、休屠王之后，“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①，然后设置郡县，在西平以西建临羌县；在西平以东建破羌县，隶属陇西郡。此外，还设置了特殊的建制，如属国都尉。统治西羌最重要的人物是护羌校尉，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此职。东汉以后，护羌校尉被列为常职，任免颇为频繁。根据汉王朝的地方行政建置，凡在郡县之外的羌人，被称为“外羌”，因其在郡县边境多筑有障塞，故也被称为“塞外羌”。东汉将归降的羌人大量内迁，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② 他们和汉族劳动人民友好共居，却遭到东汉官吏及地方豪强势力的欺压、奴役。因此，西北羌人起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38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1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